

再华化与印尼华人的身份重构

以印尼客家人为中心的考察 2

民族。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基于经济绩效的威权政治合法性，苏哈托政权又试图对华人大资本加以笼络、扶持和利用，以推动经济增长，并且换取华人精英的政治忠诚与支持。

在长达32年的威权政治时期，强制同化政策不仅极大地削弱了印尼华人社会的中华文化外在表现，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人——尤其是这一时期出生的新生代华人对印尼公民身份认同日益增强，并且越来越亲近土著文化。这实际上是华人通过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向土著族群妥协让步，以换取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生存机会甚至某些特权。其后果是，去华化成为大多数印尼华人的身份构建策略。新生代华人甚至不再认为强制同化政策是对华人社会的侮辱和压迫。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华人努力保持自身的中华文化特性。这些华人大多是20世纪上半叶移民至印尼的新客家人及其在印尼出生的子女，他们接受过较为完整的华文教育，并在殖民地时期饱受土著族群的敌视和土生华人的排挤。在威权政治时期，这些华人在宗教场所与活动的掩护下进行华文教育，保留了不少传统的中华文化遗产，以此作为对威权政治无声的抗议，他们最终成为后来再华化的主要倡导者与坚定实践者。

印尼民主政治精英掌控国家政权后，同样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对威权政治遗产进行了清算，其中就包括废除强制同化的华人政策，转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民主化时期，印尼政府废除了“非原住民”与“原住民”这两个相对立的称谓，华人能够在法理上享受与土著族群同等的公民权利。因此，印尼华人能够公开谈论自己的华人种族身份，并且公开进行华文教育、成立社团、创办华文媒体以及庆祝华人的传统节日。



日。最重要的是，民主机制的建立使得印尼华人有更多机会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输入国家的政治过程，甚至有机会通过执掌政治权力，主动巩固和扩大华人在印尼的公民权利。可见，民主化改革是印尼华人再华化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充分利用民主机制是再华化的根本手段，而成为民主化国家的平等公民则是再华化的根本目的。如果印尼缺乏民主政治环境，诸如中国崛起与中国印尼关系改善之类的外部因素恐怕难以助力印尼华人的再华化。

印尼华人从惨痛的历史中得出的教训是：第一，必须坚决反对专制、拥护民主；第二，必须彻底消除土著族群对华人社会的偏见；第三，不能彻底抛弃自身的文化，因为一味地向统治者和土著族群妥协让步并不能根除他们对华人的偏见；第四，必须保持华人社会的团结，因为统治者与其他族群在实践中倾向于将华人类群视为一个整体。因此，民主化时期的再华化绝不等同于原教旨式地回归传统的中华文化，更不等同于拿来主义式地从中国与其他华人社会那里移植文化，而是要构建一种独一无二的印尼华人文化。这种文化应当一方面能够促进华人忠于印尼国家，主动融入印尼主流社会与土著族群共生共荣，并且又不至于迷失自我；另一方面，则能够在包容华人社会内部多样性的基础上增进其凝聚力。

就目前来看，虽然印尼华人社会各次群体在华语水平、祖先崇拜意识的强弱程度，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熟悉与热衷程度，

以及对中国与印尼关系的认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将“再华化”与“再中国化”严格区分开来，对于必须坚持印尼公民身份认同有着基本共识。不过，究竟应当如何通过政治参与或公民社会活动来推进再华化才有利于整个华人社会的长远生存与发展，是现阶段及未来印尼华人社会必须正视的问题。不同的华人次群体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此，本文将以前述印尼客家人为例进行阐述。

二、印尼客家人的特征及其再华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一）印尼客家人的历史及其族群特性

客家人移居印尼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现有史料记载，南宋末年梅县松口人卓谋等十余士兵逃难到西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是为客家人定居印尼之始。印尼客家人主要聚居在雅加达、山口洋、泗水、坤甸、棉兰、万隆、三宝壟、梭罗、巨港、亚齐等地。

印尼客家人的数量难以确切统计，印尼华人社会内部和学界都倾向于认为，印尼客家人大约占印尼华人总数的30%~40%。然而，印尼华人总数也是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印尼华人社会内部普遍认为，华人总数在2000万左右，约占印尼总人口的8%~10%，其中也包含土生华人。综合上述数字估算，印尼客家人大约有600万~800万人。但是，2010年印尼人口普查数据却显示，华人数量为2,832,510人，约占总人口（236,728,379）的1.2%，在官方认定的31个种族

中排名第18位。此次普查是全样本调查，种族认定标准是调查对象的自我认同。为何上述两种数据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实际上是由身份认定标准的差异导致的，后者是一种自我认同。

印尼客家社会曾经涌现出一批影响印尼华人社会变迁乃至印尼历史进程的精英人物。18世纪末，来自广东嘉应州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建立了兼具商业集团与政治实体性质的“兰芳公司”（又称“兰芳共和国”）。在罗芳伯的领导下，兰芳公司不仅将华人社会有效组织起来，还与土著合作，共同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且组建军队成功抵御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事入侵。兰芳公司吸收了大量的客家男性移民，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完全接受客家的风俗习惯。19世纪的印尼棉兰客家侨商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发扬客家人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胆识过人的精神，经营种植业，领导同侨开设商店屋舍，使当时一片荒凉的日里（今印尼棉兰）变为商贸发达、百业兴旺的苏岛省会。”他们作为棉兰开埠功臣，先后担任了荷印殖民政府的华人玛腰。如今，棉兰的成德桥、张榕轩事迹纪念碑、茂榕园和张亚辉故居等遗迹，成为棉兰甚至印尼的历史文化地标，前来缅怀的不止华侨华人，还有印尼原住民和外国人。20世纪初，客家人丘燮亭、梁映堂和潘立斋参与创办了印尼的中华会馆和中华学堂，推动了印尼现代华文教育的发展。

印尼独立以来，尤其

是民主化改革以来，客家人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参政能力在华人社会中十分突出。例如，雅加达前首长钟万学、西加里曼丹前副省长黄汉山、山口洋前市长黄少凡和现任市长蔡翠媚、邦加一勿里洞前省议员李孟荣以及印尼中央国会议员李敏东等，都是积极推动印尼民主化进程的客家人。他们向印尼其他族群表明：作为印尼国族的重要一员，华人有权利、有义务、有决心、有能力参与国家和多元社会的治理。钟万学是印尼客家人参政最突出的代表，他凭借实干精神和个人魅力，在受到极端宗教势力的攻击后，仍然获得了不少华人和土著民众的支持。

客家人移民印尼及融入当地社会的历史，展现了其勇于开拓、吃苦耐劳、团结互助和崇文重教等族群特性。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移民文化和丰富移民经验的族群，客家人一方面非常强调客家方言和习俗的传承对于维持族群身份认同和内聚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融入移民目的地的主流社会。因此，客家人在印尼华人再华化中的表现值得深入研究。

（二）印尼客家人推动印尼华人再华化的主要表现

苏哈托执政时期，在强制同化政策的压力下，华语学校被迫关闭，华文报刊被迫停办，华人社团被迫解散；华人不能公开庆祝传统节日和开展民俗活动。更重要的是，华人被禁止在公民身份证上使用华文姓名。这一延续至今的政策造成许多印尼华人——尤其是年轻华人，丧失了最重要的身份符号，从而对自己家族的移民历史和中华文化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强制同化政策不仅磨损了印尼华人的中华文化外观，也弱化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强制同化政策对基本